

【读典】

《说苑》：旨在以古鉴今的一部“谏书”

《说苑》的编纂目的

《说苑》是西汉刘向主持校理皇家图书期间编成的一部历史故事集。在《说苑序奏》中，刘向说道：“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巫校籀，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爲百家，后令以类相从，——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

《说苑序奏》是《说苑》的序言，主要介绍了成书过程及书籍概貌。那么，刘向为什么要编《说苑》这部书呢？应该说和他编《新序》的目的是一样的。《汉书·楚元王传》说：“及采往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明代张溥在《百三家集题辞》中认为，刘向是“鉴往古而著《新序》《说苑》，其书皆非无为而作也”。清代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达意而为止。”“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非无为而作”“冀以感悟时君”等语，说明刘向编撰《说苑》旨在以古鉴今，是把它作为“谏书”来看待和使用的。

《序奏》中“臣向昧死”一句，虽是古代大臣著书时为了表达对帝王的忠心和忠诚而经常使用的套话，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这四个字颇能表达刘向编撰《说苑》一书时的心态，即“冒死进谏”。

应该指出，以著述当“谏书”的心态刘向早已有了，到编《说苑》时达到了极致。此种心态与刘向的政治理想及政治人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有识之士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他们都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都代表着各自时代的“社会良心”，而这种“社会良心”所体现出的精神，正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他们不惜舍弃自己的家，舍弃自己的亲人，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们始终为自己的理想进行不懈的努力。

在这个背景下，有学者指出，“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

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历经昭、宣、元、成四代。史书记载，西汉政治“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刘向的汉室宗亲身份及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其具有强烈的挽救汉室危亡的愿望，并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可以说，他对自己在政治生活中应当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处的位置和应有的责任感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在行为的选择上总是能够坚持己见、始终如一，保持着政治志向与政治态度的一贯性。刘向给皇帝上的奏折，及其编纂的历史典籍，无不渗透着他的政治志向。

正是由于《说苑》旨在鉴古知今，所以后世对这部书很重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这样说道：

若夫陆贾《典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人诸子之流。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刘勰认为《说苑》一类书，从思想内容的广泛性而言，牵涉到各个方面的问题，应该属于诸子的范畴，它们实际是诸子散文的延续，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说苑》的地位。再者，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刘勰肯定《说苑》等书和先秦诸子一样，“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也就是说，这些书是承“万古之上”，启“千载之下”，而万古长存存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明洪武十五年（1382），国家颁发《说苑》，要求学校老师对学生讲读这部书。

《说苑》的内容和编排

《说苑》全书二十卷，每卷有一个标题，下摄数十篇。第一章是总论（个别卷除外），后面各章分别从不同角度体现本卷的主旨。这种编写体例，明显受到了《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的影响。

从全书的编排上看，经世致用的目的十

分明显。第一、二卷为“君道”“臣术”，说明刘向看到了君王和大臣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后面十八卷，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国家政治进行了阐述，它们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从、杂言、辨物、修文、反质。这十八个方面基本涵盖了国家政事的所有方面，可以看作是治国的纲领。

从内容上看，《崇文总目》的说法是“所载皆战国秦汉间事”。然而，纵观全书，其实绝大多数是先秦之事，极少数为秦汉之事。所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说：“以今考之，春秋时事尤多，汉事不过数条。”

《说苑》体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但也兼有道、墨、法家的主张，涉及到忠君爱臣、敬天保民、尊贤斥佞、知恩图报、奖励罚罪、加强修养、不辱使命、修文尚乐、戒奢崇俭等多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说苑》的表现形式

《说苑》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有重要价值，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特点，正如刘勰所说：“越世高谈，自开户牖。”

具体表现为四个特点。第一，以历史故事为主，杂以议论，使历史故事既有生动性，又有明确的主旨和主题，从而将叙事和议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君道》首章说：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静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物，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这里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通过晋平公和师旷的一问一答，将为君的根本道理讲得很清楚，也很透彻。更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言“人君之道”，不仅仅是首章的主旨，也是其后各章故事的宗旨，可见其叙事与议论之间有机结合的巧妙构思。

第二，故事篇幅虽然短小，但表现手法多样，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一般来说，《说苑》中的每篇都没有故事发生的确切时间或地点，只有简单的叙述和人物对话，人物也往往只有姓名，性格近于白描，但表现手法却有着体制短小而富于变化的特点。有的全是对话，在对话中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揭示

主题，比如《建本》中“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这一章。有的因小见大，借题发挥，寓意十分深刻，比如《敬慎》中“孔子见罗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这一章。

第三，文章除大部分有史实依据外，还有部分内容包含丰富多彩的想象和虚构成分，因而具有寓言和神话传说色彩。比如《正谏》中说：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

这就是寓言色彩很浓的一段文字，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劝吴王停止伐楚的行动。

第四，无论叙述、对话还是议论，语言都简练而传神，富有哲理，从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人物的品德和修养，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至公》中“吴王寿梦有四子：长曰谒，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号曰‘延陵季子’，最贤，三兄皆知之”一章。故事中有叙述、有对话、有议论：叙述的文字将谒、余祭、夷昧的让贤，僚、光的贪权争位，季札的“不以国私身”“弃尊位而无怨”勾勒得入神入微。人物的对话也高度个性化，庶兄僚的“我亦兄也”四个字，将其权欲熏心的灵魂描绘得入木三分。议论文字犹如格言警句，既生动形象，又极富哲理。“君子以其不取为仁，以其不取国为义”一句，“不杀”“不取”，“为仁”“为义”，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将季札的品格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说苑》的人才思想及其价值

《说苑》是一部以古为鉴的作品，它包含了很多寓意深长的历史故事，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从中有所借鉴。特别是作者寄托于史事与杂议之中的人才思想，广泛而深刻，丰富而含蓄，从人才学的角度看，可以称《说苑》是一座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的宝库。

首先是人才的德行问题，这也是从古至

【史博馆】

历史上的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作为各国政府各个时期获取人口资料、掌握国情国力的一种最基本的调查方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而真正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只有两百来年的历史。

“强国知十三数”

自有国家诞生以来，一国之内到底有多少人口，就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据《史记》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就是说，早在大禹时期，就进行过人口调查了，后人记载，说大禹为治水进行人口调查，当时的人口为1355万人。不过，这个数字只是后人的传说，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

从一个侧面来说，人口的多寡也是国力的象征。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人口调查也被称作“国势调查”。

早在我国的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就很重视人口调查，他说：“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经于水，险也。”他不但在齐国大力推动人口统计工作，还十分注重调查人口的素质，比如有专门技能的男人和女人有多少、嫖夫、寡妇、病人有多少。秦国的宰相商鞅，也十分注重人口调查工作，他下令在秦国将总人口按壮男、壮女、官吏、商人、读书人、残疾人等十三类分别统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强国知十三数”。

从世界范围来看，早在公元前4500年，巴比伦王国就举办了全国性调查，按族登记人口。在《旧约全书·出埃及记》中，也提到过两次人口清点，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491年，第二次则是由大卫王下令在公元前1017年进行的。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罗马“王政时代”的第六位国王塞维·图里乌正式创立了“国势调查”（census）制度。至今，西方一些国家的人口普查，仍然沿用着“census”这个拉丁文名词。不过，罗马时代的人口调查，和埃及、巴比伦等古代奴隶制国家一样，往往只计算能上阵作战的丁男，或只计算各户的纳税人，不包括奴隶、外邦人，也不包括妇女和儿童。

罗马帝国的人口普查每五年举行一次，前后历时八百年。为了财政及军事上的目的，居民人数及其财产均在查计之列。此项普查在公元前五百年时，范围已扩展至当时的罗马帝国全境。

我国古代人口登记制度世界领先

人口登记制度，是中国自古以来一项十分有特色的人口管理制度。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在人口管理、人口清查等方面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最早的人口普查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周代。周代设有专门的官府“司民”负责人口统计、人口普查工作。在那时婴儿出生后，首先要到基层居民组织“比”“闾”登记，还要上报到县、州等官府里备案，人口死亡后要及时申报注销户口。

秦国很重视对户口的管理和统计。据记载，商鞅有这样的说法，“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就是说全国都要把出生和死亡的人口加以统计，生的上户口，死的销户口。

东汉对户口调查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称为“案比”，上至80岁老人，下到6岁以下孩童，都要一一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也很细，连身高、相貌都要调查，这些从现在一些考古实物中也可得到证明，在一片汉代的《居延新简》上就写有：“戌卒南阳武当县龙里张贺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就是

说，这个叫张贺的人口出生在南阳郡武当县龙里，30岁，身高七尺二寸，肤色黑。

隋朝建立后，对户口管理也很严格，多次进行全国规模的户口大检查，并且实行“貌阅”，就是对每户的家庭成员都要当面验视，看性别、年龄是否符合，并发动检举，凡是户口不实的，不仅户主要受罚，乡长里正也要发配服苦役。所以史学家一般都认为隋朝户口统计比较接近实际。据隋朝大业五年清查，当时人口总数是4602万人。不过经考证，这只是中原地区人口，江南和边远地区还有大量人口没有统计进来。

唐朝时，因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急剧增长，最初的人口管理也很严格，但从高宗开始，管理逐渐松弛。

宋朝在赵匡胤登位之初就着手统计、普查人口。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规定：每三年普查一次人口、编造一次户籍。因人口普查在同年进行，因而称人口普查登记的册子为“闰年图”。宋朝的人口普查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只登男、不登女。因而人口统计数字并不完整。

明朝在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开始实行“户帖”制度。“户帖”是一种张贴在外，群众可见的户口清册。紧接着，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起，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州县，以户为单位进行户口登记。登载户主、人口姓名、年龄、家庭人口与户主的关系以及田宅、资产、职业等项目。在职业项目内又分为军、民、匠、灶（制盐户）四籍，自此以后，每十年对全国人口普查一次。每次普查时，填写的户口登记表共两份，一份交给民户收执，另一份上报中央政府户部。由户口登记表而汇总的户籍册，用黄纸加封，因而称这种户口册籍为“黄册”。

清朝因袭明朝的户口管理办法，建立了户口黄册制度。清世祖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下令每年要统计人口、人变化情况。康熙、雍正帝先后下诏把丁税并入田赋，以后增加人口永不加赋，即所谓“摊丁入亩”。摊丁入亩就是不收人头税了，根据田产来收税，因此导致清朝人口激增。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人口总数达1亿4341万人，这是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1亿。据清末道光年间的统计，当时的人口已经达到4亿多人。

明、清两代都有保甲制度，调查人口。明、清的保甲，每十户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保”。“保”直属县衙。每户在门上悬挂户牌，标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同居亲属及迁移住所等。并按保甲系统报告生死、婚嫁和迁移等人口变动。

中国的人口登记制度在古代正逐渐传播到日本、朝鲜等邻近地区，并形成了他们各自的特色。

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花了18个月

按照联合国对人口普查下的定义：“对一个国家或一定疆域内的所有人口进行有关人口统计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资料的收集、加工整理与出版公布的全过程。”从这个标准来说，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是由美国开始进行的。1790年，也就是美国建国后的第14年，美国开始进行人口普查。此后，每隔10年就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一直到现在。

1790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是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日。当时担任国务卿的杰斐逊委派17位法官去监督第一次人口普查，他们雇用了约650名助手，或骑马或步行从北端的缅因州一直

走到南方的佐治亚州，整个调查共花了18个月，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当时共有近400万人口。

美国建国后，人口增长很快，到南北战争爆发前，人口已经从1790年第一次普查的不到400万增长到1860年第七次普查的3144万，70年间增加了7倍，增长速度惊人。

在1890年的普查中，一位名叫霍勒里斯的年轻调查员发明了能根据代码孔自动整理资料的机器，大大地节省了人口普查局整理资料的时间，用机器代替人力整理资料还为日后计算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霍勒里斯后来成了著名的IBM公司的创始人。

调查员的人口调查中还可能发生各种意想不到的趣事。比如当年有一位年轻的调查员正在向一位牧师做人口调查时，一对年轻的恋人敲响了他门，询问因而中断，调查员被临时当成证婚人。还有一位调查员去向一个农民做调查登记，那个农民驾驶拖拉机在耕地，耕一趟回来被问及一个问题，调查询问竟持续了5个小时。

从美国开始，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逐渐向全世界推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覆盖了全世界的人口。

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

1928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曾经试行了一次全国人口调查。当时的内政部于1928年5月发出了在三个月内进行人口调查的指示，但没有成立任何统计机关。调查提纲和程序据说是由警察厅规定的。这次调查没有规定标准时间，只规定调查常住人口，调查表按户填写。调查的项目有：姓名、性别、与户主的关系、年龄、出生时间与地点、在校学习年限、生理上的缺陷等。

当时人口统计成员主要是警察，但警察不是挨家挨户地上门调查，而是要各地方人口自己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

虽然说要三个月内完成人口调查，但直到1931年2月，才发表了最终的人口调查数字：47480万，这就是当时常说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的来历。不过，这个调查数字是很不准确的。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1953年，新中国开始了第一次规模巨大的全国范围的普查，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

1953年以7月1日零时为人户调查的标准时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考虑到当时人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农村里的中学生很少，又无普查经验，只确定了当时最急需的姓名、与户主的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和住址6个项目。根据这次人口普查，当时全国的人口总数为601936035人。

我国古代人口知多少

我国古代的人口普查，从周代以来各个朝代都在进行。古代人口普查，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人口数据资料。现部分摘录如下：

年代朝代人口数
公元5年汉平帝时5959万
公元609年隋炀帝时4601万
公元755年唐玄宗时5291万
公元1066年宋英宗时2909万（男）
公元1291年元世祖时5984万
公元1403年明成祖时6659万
公元1834年清道光时40176万

谭萍



【书香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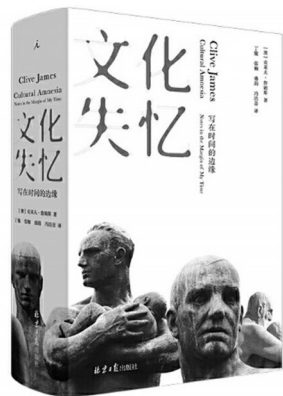
容湖书香。 石浩/摄

【悦读书架】



（汪曾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主要围绕家和生活，分四辑：辑一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辑二自得其乐，随遇而安；辑三汤和天气好；辑四日日有小暖，至味在人间。是汪曾祺写给大家的美而幸福的“活法”，几乎囊括了汪曾祺最精华的散文，并附录汪氏三兄妹写“老头儿”和母亲的文章。是了解汪曾祺家风及生活的最佳读本。读一读汪曾祺的文字，你会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诗意的，会更加热爱这个世界。



（[澳]克莱夫·詹姆斯/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